

doi:12.3969/j.issn.1672-0598.2012.03.006

国外服务外包与服务贸易自由化研究评述*

——兼析对我国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启示

曾世宏

(湖南科技大学 商学院,湖南 湘潭 411201)

摘要:以生产性服务为载体的服务外包是第二轮国际产业转移的趋势,服务贸易自由化则会大大加深这种国际产业转移趋势,虽然服务外包具有显著的正外部性与负外部性,但总的来说,服务外包有利于发展中国家承接国际产业转移、促进本土产业价值链升级和现代服务业发展。中国作为重要的发展中国家,要清除种种体制性障碍,积极发展服务外包与推进服务贸易自由化,承接新的国际产业转移,促进产业价值链升级。

关键词:服务外包;服务贸易自由化;产业转移

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0598(2012)03-0033-07

一、引言

在通讯技术不发达的实物经济时代,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与国际投资理论认为大部分服务产品主要是一种非贸易商品,只能在一个国家内部进行消费。即使小部分服务能够进行贸易,由于国家与国家之间在工资水平、货币汇率、历史文化等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服务产品的输入与输出会对投资国和接受国之间产生不对称的影响,主要是对输出国和接受国的劳动力就业、居民收入分配、产业发展战略在一定程度上产生副作用。

因此大多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服务贸易采取限制的政策以保护本国的劳动力就业和产业的协调发展。但是随着现代通讯技术特别是互联网的飞速发展,现代服务业已经成为可贸易商品。并且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跨国

企业的全球生产经营活动,特别是发达国家的服务业外包活动带来的管理技术和工程技术对本土国家的企业和产业在产品生产和市场方面的“挤压”效应越来越明显,因此,本土国家的产业价值链升级势在必行。

而作为产业价值链的管理和工程咨询服务、金融服务、物流仓储服务、营销服务等非生产性环节,或者称生产者服务业在本土企业或者本国产业价值链升级的过程中能否接受现代服务业的自由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或者服务业的外包业务,如果现代服务业能进行自由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或者生产者服务业进行外包则会对输出国和接受国在雇员就业前景、企业创新绩效和产业发展战略等方面产生什么影响,这是当前国际经济学界

* [收稿日期]2012-03-12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课题“以全球价值链引导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11AZD002);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部地区承接沿海产业转移的政策措施研究”(09&ZD041)

[作者简介]曾世宏(1974—),男,湖南益阳市人;湖南科技大学商学院讲师,南京大学商学院应用经济学博士(产业经济学),主要从事产业经济、服务经济与能源经济研究。

关于服务业外包与服务贸易自由化的一个热点问题。关于这个问题产生了大量文献,本文在对这些主要文献进行评述的基础上论述了国际服务业外包的现状及其开展国际服务外包的原因、服务外包和服务贸易自由化的正外部效应与负外部效应、服务业外包、服务贸易或者服务 FDI 发生机理及其决定因素、服务业外包与产业价值链升级和城市功能转型以及对我国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启示。

二、服务外包、服务贸易自由化的现状及其发生机制

(一) 服务外包与服务贸易自由化的现状

外包一般是指某个企业从其外部购买实物投入或者服务,按照这个定义,外包可能是国内的,也可能是国际的。现在人们主要关注的是国际外包,即发达经济的企业从低工资国家的企业购买低端的实物投入(包括劳动力)或者服务,或者不发达国家的企业向发达国家的企业购买高端的实物投入或者服务。国际外包包括跨国企业内部的国际外包和所有权独立企业之间的国际外包。国际外包构成国家商品和服务进口的一部分。

由于分包出去的生产各阶段的信息很难获得,精确度量外包活动实际上是很困难的。因此,经济学家对国际服务外包还存在较多的模糊认识。目前,国际经济学界对外包的度量一般是基于计算机和其他商业服务进口的整个经济领域的度量,或者只测算某个产业的服务外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两位研究人员 Amiti 和 Shang-Jin Wei(2004)^[1]基于上述方法全面阐释了当今国际服务业外包的发展现状,认为虽然服务业外包一直在平稳增长,但总体水平仍然很低,例如美国 2003 年进口的计算机和商业服务只占 GDP 比重的 0.4%,实物外包比服务外包的比重高出很多,而且美国计算机和商业服务的出口量大大多于其进口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计算机和商业服务的进出口国家,大多数的发达国家并没有比许多发展中国家具有更加密集的服务外包。

虽然早期的服务业外包主要是集中在一些像电话呼叫中心、计算机服务、标准的金融服务等低级的商业服务中,但当今大量的证据表明高级生

产者服务外包变得越来越普通。为什么高级生产者服务外包变得越来越普通? 主要的原因是服务业全球化可能给本土企业和人力资本接受国际服务外包提供了机遇,而在承接国际服务外包中通过协作与学习,可能对本土制造业的产业升级产生溢出效应。事实证明,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服务全球化与服务外包的扩展和深化大大提升了制造业、服务业的生产效率,成为推动当代服务业生产方式变革和经济全球化新浪潮的重要力量。

Beyers(2004)^[2]对这一经济领域出现的重要当代现象提供了一个有关美国方面的分析,并且通过问卷调查形式获得了有关生产机构进行分包或外包活动的真实原因,即是否购买作为生产过程一部分的非常规的专业化服务,是否参与分包与合作,服务提供地点是否随时间改变,企业为何购买本来可以内部生产的外部服务。调查结果是 45% 的提供生产者服务的企业在生产自己的服务过程中都购买专业化的服务或者从事外包活动,89% 的被接受调查企业认为他们的这些行动是外包活动,而主要原因在于这是追求低成本、更好的质量、技术需要、获得核心职能、管制需要。

(二) 服务外包、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发生机制

大量文献指出国际服务外包的出现得益于下列主要因素。第一,企业为了减少劳动力成本增加了他们对独立承包商的依赖,通过把部分业务承包出去,组织可以节约对雇员招聘、监督、管理、培训、失业保险、养老金等各项费用;第二,为市场竞争设定内部绩效标准以及确定是选择自己生产还是他人供应安排的相对成本与收益比较的努力刺激了外包的产生;第三,分包越来越被用作减缓消费者对企业产品和服务不规则的需求;第四,组织寻求安全获得专业化技能和独特才能刺激了外包的产生。那些组织内部难以发展或者费用太昂贵,以及只存在于组织核心能力之外的技能通常被认为最好是从外部供应商购买。

Lileev 和 Biesebroeck(2008)^[3]通过使用加拿大 1988—1996 整个大制造业企业体系,通过一个简单的产权模型探讨了外包决定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被解释,他们的主要结论是投资的专业化程度

越大,外包的可能性就越小;购买者和出售者投资的互补性也与更少的外包相联系;产权对投资密度和最优所有权之间联系的预测仅仅得到具有低互补性交易的支持,低互补性将更多地导致一体化,当购买者投资占主导时,购买者投资的边际效果将使一体化更有可能,而当供应商的投资相对更重要时,外包更有可能。Markusen, Rutherford 和 Tarr(2009)^[4]也认为限制自由化的服务 FDI,会对进口国的收入和福利产生强有力的影响。

像管理和技术咨询等生产者服务能够提供专业化知识,这有助于本土企业以更低的单位成本发展。但是像这些作为中间投入品的生产者服务是不可贸易商品,或者交易的成本很高。所以它们得以引进的最好方式便是 FDI,因此,国家对待服务贸易与 FDI 的政策理所当然需要不同。

但保护国内技能型劳动力不受进口服务的竞争可能反而会降低国内技能型劳动力的收益,因为在服务产业的 FDI 自由化以后,与国内服务产业相比,进口服务节约了国内技能型劳动力的使用,下游产业生产率和规模效应的提高可能导致国内技能型劳动力的实际工资上涨。进口服务多样性的增加导致了下游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加,但是对下游产业的相对影响依赖于他们怎样密集地使用中间服务。影响最终产品生产的不同生产率效果足以让服务 FDI 决定某种产品是进口还是出口。

因此,政策制定者应该知道对国内服务产业的保护会影响不同的选民。虽然国内资本所有者会受到国外直接投资的负面影响,但是国内技能型劳动力很可能会寻求工资上涨。而且真正使用这些服务的下游企业会从外国直接投资中收益,他们的扩张能力惊人地提高。

三、服务外包和服务贸易自由化的正外部效应与负外部效应分析

(一)关于生产者服务业贸易和 FDI 对输入国专业化市场的影响

生产者服务作为一种中间投入品,内涵了出售者长期累积的知识资本投资,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的性质,并且它们可以根据购买者的需要进行定制。进口这些生产者服务会对转型经济国家或

者发展中国家带来许多好处:第一,这些生产者服务是本土国家生产者服务的互补品而非替代品;第二,它们能够大量节省本土国家稀缺的技能型劳动者;第三,它们能够使本土国家获得目前的专业化知识和一些遗失的关键中间投入。

允许生产者服务内部贸易和 FDI 的自由化规则能对本土企业技能型劳动力的积累提供很好的补充,会对接受国的产品模式贸易进行修正,使之能够出售更高级的比较优势产品,会对接受国的技能型劳动力的转型过程产生实质性的改变。因此接受国应该对生产型服务的进口进行补贴,并尽快对技能型劳动力流动的体制转型进行公平的改革。

关于服务业外包的技术溢出效应,Fernandes 和 Paunov(2008)^[5]研究表明,承接外包的代工合约与企业员工培训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Markusen, Rutherford 和 Tarr(2004)^[6]认为进口生产者服务会对转型经济国家或者发展中国家带来许多好处,能够使本土国家获得目前的专业化知识和一些遗失的关键中间投入。关于国际服务外包对发达国家福利的影响,Moizzo 和 Soete(2001)^[7]在研究国际外包的创新和工资效应时指出,国际外包增加了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低工资劳动力的利用,从而通过成本节约增加了发达国家的盈利能力。

(二)关于服务业外包对制造业创新和生产率提高的促进作用

总体而言,生产者服务业越不发达的地方,企业成功进行产品创新的绩效就相对越差。因为这些企业很难从当地获得外部的技术和管理投入。当然,这种分析是建立在以下四个方面的理论基础之上的。第一,企业的内部规模不经济典型地阻碍了其获得内在的科技竞争力;第二,产业中的创新企业与其外部的咨询服务之间存在技术联系,技术要素能够使得这些企业从外部各种领域中获得超出它们自己内部竞争力的帮助;第三,生产者服务对地区经济变迁的促进作用,即生产者服务欠发达的地区,不可能支撑当地高水平的产业扩张、创新和就业增长;第四,产业和生产者服务两者间的空间定位联系存在良性互动。

关于技术外包对制造业企业创新绩效有何作用,Pherson(1997)^[8]通过对纽约州400多个制造企业进行问卷调查分析后发现,凡是能够经常进行产品创新的企业基本上都是能够善于利用各种外部性专业化知识的。而且企业所处的地理环境能够影响它们外包活动的深度和性质。

关于服务外包对生产率提高的促进作用,Fixler和Siegel(1999)^[9]通过建立企业外包决定的数理模型论证了外包的增加能促进服务业与制造业生产率趋同的增加,认为一旦由于对外包的津贴刺激制造企业对服务业外包需求的增加,那么服务部门的生产率很可能出现增长。Sako(2006)^[10]也认为英国的服务外包对商业服务业生产率提高起了巨大刺激作用。

而服务外包对制造业创新和生产率提高的作用可能主要是通过下列因素来实现的。第一,从需求方来看,公司战略重组,即把原先捆绑在一起的公司职能分开和公司商业过程垂直非一体化提高了对商业过程服务外包的需求。第二,从供给方来看,更高要求的专业化、标准化和商业过程的加强以及向诸如专家建议和定制化的解决方案等更高附加价值的商业服务价值链环节转移。第三,一些服务变得越来越像产品,通过标准化和数字化,低技能和高技能的工作都能得到生产率增长。

(三) 服务外包对外包制企业中就业数量和质量的影响

服务外包对就业质量的影响是指服务外包对外包制企业中提供服务的雇员态度和行为的影响,这主要体现在下面几个方面:第一,雇员的就业安全,分包企业很难维持长久的就业关系,因为商业合同都有固定的期限,这意味着合同总归有终止的时候;第二,分包商由于缺乏组织资源巩固内部劳动力市场的运营以及维持这种长久的就业关系,他们不愿意对雇员的培训和发展进行更多的投资以提升他们的迁升机会;第三,分包商为了减少成本,最大化企业利润,对雇员推行更加严厉的监管和劳动控制的工作管理体制;第四,外包制企业中对雇员的工作管理体制更加严厉,雇员享受的待遇和提升的机会更少,雇员选择离职的意

图更强烈。

Walsh和Deery(2006)^[11]考察了内部生产企业和外部服务提供企业(外包企业)中雇员对他们工作和就业安排的态度和行为,界定和比较了有助于形成他们这种组织承诺与离职意图的各种因素。

而关于服务外包对于就业数量的影响,Amiti与Wei(2004)^[12]研究表明,服务外包不仅不会引致就业总量的下降,反而会使企业或者部门获得潜在的高效率,这会导致同一部门能够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以抵消由于外包减少的就业岗位。Falk和Wolfmayr(2007)^[13]同样研究了国际服务业外包对就业带来的影响,认为对于非制造业部门来说,虽然国际购买的服务总量不重要,但是从五个欧盟低工资水平国家购买的服务统计显著,且对就业只有很小的负面影响,就影响的程度而言,给五个低工资水平国家的服务外包从1995—2000每年只减少0.2个百分点的就业,对制造部门而言,虽然从低工资国家购买的服务不显著,但是给低工资国家的中间材料外包对劳动力需求显示出相对小的负面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在中国和东亚国家比在中东欧国家更加深刻。

(四) 服务贸易自由化对发展中国家能否带来利益

已有的文献主要讨论了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服务贸易壁垒的分类和服务贸易壁垒大小的定量研究;第二,贸易自由化降低服务贸易壁垒的定量研究;第三,服务贸易自由化与经济增长绩效关系的计量检验,其主要结论是发展中国家的服务贸易自由化对提高其经济增长和发展的绩效是关键的;第四,金融、保险、卫生服务与交通运输服务等行业的部门贸易自由化研究,古巴医疗服务国际化提供了一个服务贸易自由化成功的案例。

但是发展中国家卫生服务的国际贸易壁垒依然有两个:其一是卫生保险覆盖范围的可能性;其二是签证、家庭购买或者注册登记限制。Whalley(2004)^[14]评价了以上关于服务贸易自由化对发展中国家好处的大量文献研究,他的主要结论是对一些重要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双边劳动密集度

很高的服务贸易自由化可能给其带来潜在的收益。

已有研究需克服的一个难题就是如何进一步夯实服务贸易概念,并分析服务贸易与产品贸易的不同之处。在讨论服务贸易自由化对发展中国家收益影响之前,最好是对各种服务贸易进行归类。这里的关键是服务提供者(企业和工人)的流动性以及个人服务项目(银行、保险、通讯)的职能处理问题。这些项目的服务并不是经常能够给发展中国家带来收益。

对服务贸易壁垒的讨论和度量也有方法论问题。其一就是对国内管制、进入壁垒、服务提供者的便捷性、竞争政策体制的谈论比国家关税更多,对导致主要问题的具有代表性和可数量化的壁垒给忽视掉了。而且大多数模型使用价值等价物来衡量服务贸易壁垒效果也不是令人信服的。

但是这些文献确实提出了一个具有不确定的结论,即如果服务贸易的 FDI 流的变化不存在,那么对大多数国家来说服务贸易自由化只具有很小的正的效果,如果服务贸易的 FDI 流的变化存在,那么对大多数国家来说服务贸易自由化的效果会更大,但在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变化很大。这可能表明了服务贸易总协定中第三种方式的自由化对发展中国家来说非常重要。如果国家之间劳动力流动有很大壁垒,服务贸易总协定中第四方式的自由化可能更加重要。总的来说,如果服务贸易自由化能替代全球要素市场职能改善,更多的资本能够流向发展中国家,更多的劳动力能够从发展中国家中流出,那么发展中国家就能以一种主要方式从中受益。

(五)服务贸易自由化和 FDI 对外围区域的负面影响

全球化的一个主要特征是资本的流动,如 FDI,或者大型跨国公司对企业的收购、吸纳或者兼并。全球 1/3 的私人生产部门受跨国企业的控制,这些受跨国公司控制的企业行为依赖于不同地区生产结构的话语权,中心区域与外围区域的企业受到的影响不同。商业服务的空间极化分布是解释目前世界区域不平等发展的原因之一。

作为服务贸易自由化和服务 FDI 的重要推动

者,跨国公司对推动基于商业服务的劳动力新的国际分布的出现起了重要的作用。Chaves (2004)^[15]通过运用处于欧盟中心领域外围的 Andalusia 案例考察了外围区域高级生产服务部门中企业行为受到的负面影响,得到的结论是 Andalusia 的高级生产服务部门的状况正在变差,为了避免当地小企业不能与大的国外企业进行竞争而可能消逝的结果,这些小企业必须努力从当地经济中获得一系列的提高。

四、服务业外包与产业价值链升级和城市功能转型

服务与产品的需求供给方式不同,产品可以在不同于其消费的地方进行生产,而服务只能在其消费地进行供给。由于服务市场的完全竞争性,所以服务贸易一般由比较优势原理决定。而由服务贸易推动的服务业外包也体现了一国或者其产业组织追求其比较优势的动态演化,这有利于发包方和承接方的产业价值链演化升级。

现代产业的高效运营离不开更加灵活的弹性生产。所谓弹性生产就是根据产业价值链分布的竞争优势原理,把整个生产体系中一些不具有相对比较优势或者不涉及产业核心竞争力的生产环节外包给企业网络中其他具有相对比较优势的企业。弹性生产方式需要企业网络之间发生的生产流的整体合作与协调。生产者服务能够提供这种企业网络协调所需要的物流、通讯、金融、管理与技术咨询等服务。而生产者服务的地理区域集聚形成了服务外包的规模经济,节省了生产者服务业外包的成本。

服务业外包适合城市主体功能区转型和产业地理分布的需要。这种产业发展战略选择主要涉及两类城市,一类是形成以全球化为目标的国际大都市,这类城市主要是提供高级生产者服务业,成为相互协调的企业网络系统中的“总部”。另一类是形成以资源型为目标的基础城市,这类城市主要是为边远矿区提供便捷的交通系统、通讯与航空网络等基础设施。通过对技能型劳动力的迁入和非技能型劳动力迁出的这种生产者服务外包形式,使传统主要以采矿为主产业的城镇转变为以生产活动和服务活动为主的功能性城市,而

采矿产业的效率和能力逐步主要依赖于更加宽广的城市基础设施提供的效率和能力。

采矿业是澳大利亚国民经济产业构成中的一个重要部门,采矿业由于服务外包的使用得到迅速增长,Connor 和 Kershaw(2006)^[16]详细考察了澳大利亚生产者服务外包与澳大利亚采矿业地理转移之间的关系。Ono(2003)^[17]通过实证研究找到了中心行政区周围的市场规模与企业获得商业服务的成本效率有重要联系的证据,他发现中心行政区周围的市场规模越大,企业依赖中心行政区对广告、簿记、会计和法律服务外包的概率也越大。

五、服务外包与服务贸易自由化对我国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启示

服务外包与服务贸易自由化的主体是生产性服务业,而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一方面有利于制造业和新兴产业的功能提升,另一方面生产性服务的发展也高度依赖于先进制造业和新兴产业的引致性需求。服务外包与服务贸易自由化为发展中国家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创造了有利条件。以“世界工厂”著称的中国,在国际产业转移的前期阶段,主要承接的是处于产业价值链低端环节的制造加工装配环节,这种“代工”的承接产业转移方式并没有推动中国本土制造企业的产业价值链升级。相对于制造加工装配环节,生产性服务业则是处于产业价值链的中高端,承接国际服务外包对于提升本国的制造业产业价值链和发展高端服务业来说,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如何承接以生产性服务业为载体的国际第二波产业转移,促进中国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对我国的启示应该是实施服务业放松市场准入管制,在国内市场、国内与国际市场之间最大限度地实现一体化,以服务业 FDI 和服务自由贸易增长带动和促进国内现代服务业的发展。

具体地说,对于嵌入在市场准入管制中的服务业发展,首要问题是在中国政治、经济体制渐进式变迁的背景中,理清各类服务业中存在的经济性管制和非经济性管制的性质,尤其是该类型服务业的外部性如何界定。在此基础上,研究如何

在管制与引入竞争之间权衡,针对各类服务业实施完全准入、有限准入、限制准入的分类管制方式;研究服务业企业在使用各种生产要素投入时要成为平等的市场主体,在要素市场上与其他产业企业进行平等、公开、充分竞争的障碍,如何把要素价格形成机制及其产生的激励机制搞对,把服务市场与物质产品市场构成的市场体系统一,使市场机制在全社会配置资源时发挥真实有效的基础作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在此基础上,一方面努力使产业结构转变合理化,跟上国际演变趋势和步伐,另一方面使得服务业价格在竞争压力下保持在一个相对较低水平,这不仅有利于服务业不断创新,提高制造业或消费者的福利,而且有利于本国服务业参与国际竞争,在服务全球化中赢得一席之地。

中国经济发展 30 多年来形成了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模式,国有垄断部门的发展和民营经济部门的发展严重不平衡,尤其体现在服务业发展上。要对国有垄断的服务业部门实施民营化,引入民营竞争对手,而不只是外资竞争对手。由于目前各类服务业的垄断还有部分由于自然垄断属性、安全性、外部性或进入壁垒高的原因,所以,对服务业反垄断或放松管制时,就要立足于不同类型的服务业专门的自有特征,梳理清楚非经济因素导致的垄断或管制与经济因素导致的垄断或管制的基础和影响效果,探讨在不同类型的垄断或管制中对引入竞争(尤其是加大民营部门进入引发的竞争)、管制和再管制之间的利益博弈。能否有效地引入竞争,关键是在合理的管制基础上寻求打破既得利益集团的机制和建立规范、有效的再管制体制。最终目标是通过竞争和引入多元化市场主体的投资,使这些服务业工资和价格形成机制具有充分的竞争性,增加服务创新,降低对物质生产部门和民生消费的成本。

服务业市场化还有一个重要方面需要研究,即国内服务业市场如何对内、对外开放,国内与国际市场如何统一和规范,在吸引服务业 FDI,实现服务贸易自由化之后,如何激励其知识和技能向本土服务业溢出。

[参考文献]

- [1] Amiti M. , Shang-JinWei. Fear of Service Outsourcing: Is It Justified? [M]. IMF Working Paper,2004;186.
- [2] Beyers W. B. . Current Trends in Outsourcing in the Producer Services in the United States [M]. XIVE Conférence RESER, 2004;September, 23- 24.
- [3] Lileeva A. , Biesebroek J. V. . Outsourcing when Investments are Specific and Complementary[R]. NBER Working Paper,2008: 14477.
- [4] Markusen J. R. , Rutherford T. F. . Tarr D. Trade and Direct Investment in Producer Services and the Domestic Market for Expertise [R]. NBER Working Papers, 2004;11345.
- [5] FernandesA. M. . PaunovC.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Services and Manufacturing Productivity Growth: Evidence for Chile [R].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2008;4730.
- [6] Markusen J. R. , Rutherford T. F. , Tarr D. Trade and Direct Investment in Producer Services and the Domestic Market for Expertise [R]. NBER Working Papers, 2004;11345.
- [7] Moizzo, M. , Soete L. .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Services: A Technological Perspective[J].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 2001, 67(4) :159-185.
- [8] Pherson A. M. . The Role of Producer Service Outsourcing in th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of New York State Manufacturing Firms[J].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1997, 87(1) : 52-71.
- [9] Fixler D. J. . Siegel D. Outsourcing and productivity growth in services[J] . 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Dynamics,1999,23(10) : 177-194.
- [10] Sako M. . Outsourcing and offshoring: implications for productivity of business services[J]. Oxford Review of Economic Police,2006, 22(3) :115-132.
- [11] Walsh J. . Deery S. Refashioning Organizational Boundaries: Outsourcing Customer Service Work[J].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2006,43(3) :234-256.
- [12] Amiti M. , Shang-JinWei. . Fear of Service Outsourcing: Is It Justified [R]. IMF Working Paper, 2004;186.
- [13] Falk M. . Wolfmayr Y. Services and materials outsourcing to low-wage countries and employment: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eu countries[J]. 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Dynamics,2007,46(3) :57-69.
- [14] Whalley J. . Assessing the Benefits to Developing Countries of Liberalisation in Services Trade, This is a draft of a report prepared for the OECD Trade Directorate[M].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2004.
- [15] Chaves R. A. . The role of the multinational firms on the producer services sector: repercussions for peripheral regions[M]. 44rd Congress of The European Regional Science Association, Porto, Portugal, August. 2004; 25-29.
- [16] O' Connor K. , Lorna Kershaw. . Outsourcing, Producer Services and Shifts in the Geography of the Australian Mining Industry [EB/OL]. <http://www.mineralswa.asn.au>,2006.
- [17] Yukako O. . Outsourcing business services and the role of central administrative offices[J].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2003,53(4) :377-395.

(责任编辑:朱德东)

Review of Foreign Researches on Service Outsourcing and Free Service Trade

——Analysis of Its Enlightenment on China to Accept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Transfer

ZENG Shi-hong

(School of Commerce,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unan Xiangtan 411201, China)

Abstract: The service outsourcing embodied by producer service is the trend of the second round of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transfer, and free service trade can greatly deepen this kind of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transfer trend, although service outsourcing has significant positive externality and negative externality, service outsourcing, in general, is helpful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to accept global industrial transfer and to boost local industrial value-chain upgrading and modern service industry development. China, as an important developing country, should get rid of all kinds of systematic barriers, actively develop service outsourcing, promote free service trade, accept new global industrial transfer and boost industrial value chain upgrading.

Key words: service outsourcing; free service trade; industrial transfer